

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初步研究

徐经泽 吴忠民

社会学的中国化，是重建中国社会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试从几个方面，对这一课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

谈论社会学的中国化，首先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科学，为什么不谈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中国化，而偏偏要谈论社会学的中国化呢？

如果我们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加以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这一问题的实际存在。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则属于社会科学。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迥然相异，前者是以自然界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后者则是以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①“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②所以，自然界中的大多数同类事物的活动往往表现出一种重复出现的情形。这种情况决定了各个国家里的凡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如化学、物理、天文等等，只要是处在同一研究水准之上，那么其学科体系都是一样的，而不会出现化学中国化、物理学中国化一类的问题。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③这样一来，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大部分活动便表现出了一种不重复性。既然是一种不重复性，那么，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差异性和多样性。正是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科学之间出现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有可能存在着中国化、美国化一类的问题。

如果说，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学科有着中国化、美国化等的可能性的话，那么，与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一类的学科相比，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不仅是一个可能的问题，而更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

第一，各个国家大量不同类型社会现象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在体系与内容方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③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面存在着许多差别。社会学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要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经验研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及历史因素的不同，各个国家往往具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现象。比如，日本与美国的社会结构很不相同。按照中根千枝的解释，在日本，团体内部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团体往往就象一个大家族。所以，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比较普遍的，失业现象相对说来并不十分严重。但美国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那里，失业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苏联与法国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在苏联，比较重视集体的利益，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无不表明这一情形。而在法国，则比较注重个人的利益。各国具体的社会现象如此之不同，就不能不使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出现一些差异。**社会学体系是基于各种社会现象经验研究而建立起来的。**而在建立的过程中，既然社会现象不同，那么就肯定要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去分析、综合社会现象。这样一来，就不能不使社会学理论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形态而出现。

第二，各个国家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别，不能不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学理论发生重大影响。社会学一词中的“社会”二字，其涵义是极为丰富的，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社会学这一概念的多样性理解。而从哪个角度去认识社会学，从什么角度去建立和发展社会学，这又与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各个国家的学者往往是基于自己的思路、自己的概念体系、自己的方法论和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建立自己的社会学体系。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本来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交流和夜郎自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学者往往是将西方社会学理论斥之为资产阶级学说而抛置一边，很少去发掘和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在这样的情形下，苏联学者也就很自然地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社会学。这样一来，苏联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哲学的色彩也就未免太浓厚。与苏联相比，美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国家。在美国，从总体上来说，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对于学术的影响是很大的。美国的社会学先是以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占压倒优势，以寻求维持社会稳定的良方，这是一种带有明显实用色彩的流派。后来，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有所衰弱，却又兴起了一个以解决当务之急社会问题为宗旨的“诊断学派”的社会学学派。这一学派的实用性与现实性比之结构功能主义流派来说似乎更为强烈。各个国家文化背景对社会学理论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社会学学科本身的相对不成熟性，也使得各个国家内社会学体系不尽一致。作为一门科学来说，不管其具体情形如何，理应拥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理应具备大量得到公认的基本观点与理论。但是，社会学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不一样。社会学从其产生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无论是就其资料准备的情况而言，还是就其结论的验证而言，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收集、积累、证明和发展。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是，相对说来这些比较老的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基本框架、基本理论是比较成熟的。虽然，它们也需要进一步更新与发展，然而这种更新与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更高层次上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它们与社会学所遇到的同类问题又有了不小的差异。社会学的这种不成熟性，造成了它在许多原初问题上的不成熟的争论性。比如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有着几十种看法（而这类问题在别的学科内相对说来已得到解决）。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看法，主要是由于论者们在界定社会学时所遵循的原则相距甚远。在对象问题上尚有这么多的争议，其他方面存在着多少争论是可想而知了。争论是件好事，是每一个学科所不可避免的事情，是通向成熟与完善的必由之路。但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相对低层次

的争论必然会造成学派的相对多样性而不是相对单一性。进一步看，社会学的多种争论势必会造成各个国家社会学界之间的多种差异。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往往具有自己明显的特色，西方国家与苏联差别很大，而西方各个国家之间的社会学也有许多差异，如西德的社会学与美国的社会学便迥然相异。可以这样说，在每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着“一般”的社会学，而只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学，“一般”的社会学模式目前看来尚不存在。当然，这里所说的各种“特殊”的社会学之间并非毫无共同之处，否则，各种“特殊”的社会学也就不成其为社会学了，而只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的意义上而说的。

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可以认定，迄今为止，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以区域流派的外貌而出现。国外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上原封不动地成长与发展。由此可见，就社会学而言，确实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学可以照原样从西方国家或是苏联等国家引进的话，那将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二

对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概念应做如何的理解呢？从前一部分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中国社会学流派，即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之中，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社会学体系。**就区域性的中国社会学流派而言，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从理论形态上看，它应是一门体系化、规范化、首尾一致的科学。**

社会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由三个部分所组成，即：社会学基本理论、具体社会学（亦称部门社会学）、方法论。其中，社会学理论是基本部分，具体社会学是社会学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直接运用，而社会学方法论则是前两者的工具。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社会学的发展，必然是这三个部分的同时发展。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同时注意这三个部分。不能以中国特色为借口而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就目前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而言，似乎是大多数人重视具体社会学的研究，而对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不够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颇。因为，社会学理论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忽视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那么，具体社会学研究也就很难向纵深发展。

我们不但要注意到社会学的体系化，还应注意社会学的规范化。这种规范化特别表现在概念的准确性和各种概念之间的严密逻辑联系性上。概念的准确，是社会学规范化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社会学的规范化将无从谈起。比如“社会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包括两层涵义，一是社会组成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二是社会的成分。有的学者在谈论社会结构时，往往只是指它的某些成分，如阶级、阶层。这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造成了概念的不准确，进而以此为基点进行一系列推理，便导致了整个体系的不规范性，使同一个体系之内充满矛盾。另外，各种概念之间应保持一种连贯性，具有严密的逻辑联系。这种说法似显多余，但对于社会学中国化而言还是颇有意义的。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由于取消了社会学，实际上一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着社会学的职能。这显然是一种失误。现在大多数学者已认识到了这种偏颇，因而主张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区分开来，以便各司其职。但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有时却难免又将大量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混入社会学体系之中。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各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但这种渗透必须是有机的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混合。象类似于生产方式、历史创造者、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一类的历

史唯物主义概念，如果不经过一番认真加工便直接混入社会学中，则难免与社会学中原有的一些概念产生不适现象，从而影响了社会学体系本身的逻辑一贯性与严密性。这种作法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其次，从时代性内容方面来看，社会学中国化应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汲取了国外社会学界一切先进的东西。

尽管社会学的区域性特征比较明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各国社会学之间毫无共同之处。社会学是一门科学，而作为科学来说，各国的社会学有共同之处，可以区分出水准的高低。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尽力汲取国外社会学界一切先进的东西。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切忌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汲取大量的国外社会学界的先进东西，从而在实际上降低了社会学中国化的水准。

在一些社会学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往往都经历了一个社会学本国化的过程。而在社会学本国化的过程中，无不汲取了国外社会学界大量先进的东西。美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十九世纪末美国才开始出现社会学。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学者们开始将欧洲社会学进行“美国化”处理。数十年后，这一过程才基本结束。社会学美国化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学学者们在汲取欧洲社会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充实了本国社会学的内容，使美国社会学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区域性流派，而且与本国其他的一些历史较为长久的学科相比，无论是就其规模而言，还是就其影响而言，都毫不逊色。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也算比较发达的。孙本文、吴文藻等学者在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无不是汲取大量的国外社会学界的先进东西。比如，孙本文就曾借鉴了大量的美国行为派的观点与资料。这些情形说明，离开了借鉴与汲取外国社会学界先进的东西，社会学区域流派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发展。

最后，从民族性方面看，它应当是一整套适于自己民族文化特性的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

汲取国外社会学界的先进成果固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地、恰如其分地将其与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性结合起来，将是无本之木而根本无法生存。许多西方的社会学概念在所处的那个社会学体系中是能够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孤立地移植于异国而失去本国的土壤，就不见得能够继续生存了。所以，我们在引进一些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时，应当注意适当赋予它一些新的涵义，而不能原样照搬，食洋不化。如果我们的社会学没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而老是跟着外国社会学转，那么，我们的社会学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二等水准，永远是世界社会学界的二等公民。因此，务必要将民族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想完好地做到这一点，具体说来，又必须注意这样三点：

其一，建立一整套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特性的概念。与别的国家相比，中国社会有着许许多多的特点。比如，中国社会的整合程度极高，民族凝聚力特强，家庭观念牢固，人口问题严重，目前又处在新旧文化大交替的时期，社会变迁色彩很强，传统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的多种体制急待改变，等等。对于这些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现有的一些西方社会学概念与理论无法给予准确的描述和解释，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为借鉴，进行新的综合与创造，建立起若干能够准确描述与分析中国社会的理论和概念。有鉴于此，故而有必要将含有民族性文化概念，作为衡量社会学中国化程度深浅的一个尺度。

其二，确立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学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即综合性

强（社会学是从总体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的），现实性强（社会学很注重社会问题的研究。它起着指导现实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学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社会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将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程度，作为判别社会学是否具有中国色彩以及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深浅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简单的验证。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学对于其他学科来说，远未起到带头的作用，而且，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太小。据此，可以断定，中国社会学这一区域流派的民族性内容实在太弱。所以，只有使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加重增大，方能使带有民族性内容的中国社会学区域流派真正建立起来。

其三，造成中国社会学区域流派在世界社会学界的重大影响。世界的社会学体系可以说是由各个国家的社会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内容与风格相互发生影响，而且随着各个社会中相同因素的增加，随着整个社会学体系的逐渐成熟，各个区域性流派相对说来将逐渐地趋同。在这个相互影响和趋同的过程中，每一个社会学区域流派都在或多或少地产生一定的影响。假如说，某个国家的社会学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那么，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国家的社会学尚没形成自己特定的内容与风格。既然这个命题带有普遍性，那么，毫无疑问，它也可以成为衡量中国社会学区域流派有无自己特定内容与风格的标准。

三

对于“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许多社会学学者有着自己的理解。大致看来，这些理解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中国化的涵义是，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即“一般与个别的结合”。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中国化意味着运用社会学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即“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不能说上述两种见解毫无可取之处。应当承认，这两种说法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启发意义。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这两种理解不免有些缺陷，而且，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或者失之模糊，或者失之偏颇。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不能说这两种见解是正确的。

先来观察一下将社会学中国化等同于“一般与个别结合”论的失误。

所谓“一般”，是指普遍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而“个别”则是指具体的实际情况。普遍的原理只有与特殊的实际状况相结合，才会有生命力。认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一般与个别结合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立足前提是，将国外的社会学等同于普遍真理，而把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视为个别性的东西。认定把国外社会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便是社会学的中国化。

应当承认，大部分学科（科学意义上的学科）的基本理论都是带有普遍性的原理。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带有普遍性的原理。这种普遍性的原理与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思想。与一般情况有些差异，社会学至今还缺乏一整套的、被大家认可的基本理论。诚如前面所述，由于社会学的历史太短，许多资料没有收集齐全，所以社会学理论的许多观点有待于进一步论证；由于各个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别，因而基于这些社会问题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不免有许多差异；由于各国文化背景的不同，难免造成各国社会学理论形态上的一些区别。这些情况说明，尽管各国社会学理论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但要想建立起一个为各国社会学界所公认的社会学体系还需要一段

时间。因此，就目前社会学理论而言，只存在着一些具体的也可以称之为特殊的区域性流派，如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诊断派理论，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等等。这样看来，目前世界上并不存在着一个公认的、带有绝对普遍性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原理作为一些片断部分而散见于各个区域性流派之中，既然如此，那么，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也就不可能等同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

将社会学中国化视为“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充分估价到了社会学的社会功能，但是，它忽视了社会学理论及社会学方法的重要意义，而将部分当成全体，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社会学体系是由社会学一般理论、具体社会学和社会学方法论三个有机部分所组成的。其中，社会学一般理论是整个社会学体系的灵魂与精髓，它对于整个社会学体系的发展起着一种指导与规定的作用。它的研究水平状况决定着整个社会学体系水准的高低，其具体形态的如何决定了各种社会学体系的不同模式。对于社会学体系来说，社会学方法论也是很重要的。社会学体系正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法论从现实社会中汲取养料，不断地完善与建设自身。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学一般理论及社会学方法论的重要性，而只是注意中国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那么，将导致这样两个错误：

第一，将造成整个中国社会学体系的肤浅化与庸俗化。将社会学中国化归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作法势必将人口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婚姻问题、就业问题等等作为社会学体系的全部内容，而且，很有可能进一步过渡到“泛社会学”，无论什么社会现象，无论这个社会现象影响之大小，皆冠以“某某”社会学，于是，社会学不再是以一个严密的、科学的面貌出现，而是被肤浅化和庸俗化了。固然，社会学的通俗教育要进行，但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这与“泛社会学”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具体社会问题研究的琐碎性和不科学性。任何一门科学，其本身都是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联系起来的。这种逻辑结构是由概念、判断、推理等等组合而成的，是一种体系。用特定的理论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由抽象再回到具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便想去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完全是不可能的。把社会学中国化归为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作法就是犯了类似的错误。试想一下，如果抛掉了特定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方法论，那么，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而也很难说是科学的。

可见，将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等同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或是等同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不很准确的。

四

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如何促使这个过程顺利进行，是研究社会学中国化时所不应回避的事情。我们认为，除了弄清其基本概念这个起码的步骤外，还需要特别注意下述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学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我们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一切社会科学的学科都受到这一现实情况的影响，尤其是以社会总体研究为己任的社会学更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社会学的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大量的哲学范畴从总体上去分析社会的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及社会动力等重大问题，得出了合乎科学的结论。就连许多西方的社会学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于社会学的中国化显然具有借鉴的作用，可以在大方向上起着引导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要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溶入社会学之中，用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去创造性地发挥、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

当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学中国化进程这种作法在我们国家社会学界大概不会有几个人不赞成。问题在于，在具体实施这种作法时，我们要注意这样两点：**第一，切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封建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学的低等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化了，并引导着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许许多多的旧观念旧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这些，不可能不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影响。就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伟大人物那里，也难免存在着一些封建主义的观点。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尽管不占主导地位，但明显存在）。多年来，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有一些明显的封建主义文化因素。比如，不是用辩证法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体系本身，而是将之视为超越时空的绝对正确、绝对不变的真理了。这是反辩证法的，是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观点。我们如果不及时克服类似的弊端，那么，将肯定会使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受到影响，使中国社会学也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固步自封，丧失掉应有的生命力，从而造成其学术水准的极端低下。**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前提条件。**如果只提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那就很有可能给这样一种错误留下市场，即：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具体结论来作为否定目前现实社会中许多具体情况的论据。比如，马克思在当时曾严肃批判过孔德的社会学。按照前述作法，同样可以用马克思的类似言论来批判当今世界上的一切社会学，并进而拒绝在中国建立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是指许多具体结论因时因地有可能发生变化（如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就很不同于马克思的多国同时胜利论），而且也指一些重要观点与体系的不断完善。总之，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去谈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去建立社会学的中国区域流派。

其次，我们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有关新成果，尤其是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大都是从某一角度去研究人类社会，因此，要想建立社会学中国区域流派，就不能不大量地借鉴别的学科的新成果，以充实和完善自身的内容。就借鉴而言，在众多的学科中，应着重借鉴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目前，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中外文化发生了大面积的接触，各种各样的矛盾相继出现。与之相适应，文化研究的热潮蓬勃展开并向纵深发展。这种“文化热”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可以提供许多可资借鉴的角度和启示。第一，文化研究可以开阔社会学学者的视野。文化学在概括文化内容时，本着涵盖面大以及层次分明的原则，把文化看作是由若干层次彼此制约、相互依存，表现又有序列性的复杂事物，对之进行系统的分析。这对社会学是很有些启发意义的。许多社会学者在确定社会学的内容时，往往将其内容规定得过窄。比如，有的人认为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社会关系的；有的人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有的人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还有的人认为社会学是专门研究社会

结构的。从文化学对于文化内容的确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述几种社会学定义实在是太窄了。第二，文化学的一些内容可以充实社会学中国区域流派的内容。比如，我们可以从文化学中有关文化趋向的部分中汲取许多养料，来完善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社会变迁的内容。国外的许多学者在谈论社会变迁时，往往分为两个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将趋于毫无二致的相同；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别将是愈来愈大。我们从文化学有关文化趋向的内容中看到，就文化的发展趋向而言，将是趋同性与多元性的高度统一、高度结合。没有趋同性的多元性，与没有多元性的趋同性一样，都是不可能的。文化学中有关文化趋向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社会变迁的趋向。第三，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找到一些“中国”的内容与特征。许多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列出了不少西方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特征，而中国文化的特征恰恰就是中国国情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吃透中国文化的特征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在借鉴这部分文化内容时，并不是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建立中国区域的社会学流派，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防止“食洋不化”社会学体系的出现。

最后，我们应当充分估价到中国社会生活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重大影响。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包括社会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学科。其生命源泉乃是现实社会。无论是就其资料的获得而言，还是就其观察角度、立足点而言，都离不开现实社会。社会学的这个特点说明了现实社会生活对于社会学的决定性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社会学的中国化实际上是在中国社会工程的实施中逐渐完成的。社会学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人们认识社会的实际状况，并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计划即设计并指导社会工程。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愈来愈高，由过去的描述社会、干预社会，发展到如今的“设计社会”（这里的“设计”并非指主观臆想）。虽然我们国家的社会学者们尚未从整体上去直接影响社会工程的设计，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工程的影响力显然在日益增长。在这个增长的过程中，社会学者们可以及时发现中国社会中的多种现实问题，不断变换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比如，可以规划一下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路迳，设计一下社区的理想模型。这些，可以极大地充实社会学中国区域流派的内容。

社会学的中国化也可以在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中汲取大量的养分。目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里的一切矛盾都在充分地表现着。旧的社会结构正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过渡。这些，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就一般情况而言，只有在动态中，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及各种功能才能充分表现出来。通过对这场社会全面改革运动的观察，可以认真地考察一下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究竟是怎样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心理是如何去影响人们的行为，各种社会制度之间应怎样保持着一种协调合理的状态，各类社会问题是怎样产生与出现的，对于各种社会组织应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形式，社会变迁有什么样的规律可循等等。总之，通过对这些由社会改革而引起连锁反应的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可以得到许许多多别的国家、别的社会中所无法获得的内容，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去认识与总结，从而丰富与充实社会学区域流派的内容与形式。

作者工作单位：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